

#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发展经济学学科综述

孙靓莹<sup>1</sup>, 戴绪龙<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北京 100731)

**摘要:** 国际发展研究是反映现实世界变化的窗口之一。最近几年的发展经济学文献对诸如援助的动因、援助有效性等传统议题的研究更为深入, 对新议题的探索也逐渐涌现。移民问题、局部地区的战争与恐怖主义活动与援助的相互关系, 援助是如何塑造受援国行为及其所产生的效果, 是反映援助国政治诉求的现实性研究。除此之外, 源自其他学科的新研究方法也丰富了学者们对传统议题研究手段, 补充了传统研究方法在诸如内生性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关键词:** 发展经济学; 对外援助; 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20)96-0023-14

## 引言

2018年, 国际发展研究分支更为多元化, 研究内容更为深入。发展经济学的内核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涵盖的内容广泛, 其核心是对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反思, 包括对诸如劳动分工与生产格局、工业革命、产业政策、国内国际发展政策改革与政策调整, 也包括经济变革带来的福利变化, 如贫困与公平问题以及医疗改革等。从各国的对外发展机构设置来看, 无论是美国的发展援助署(USAID, 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或者2018年4月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发展合作署(CIDCA,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其中“发展”所蕴涵之意更为具体明确, 都是围绕发展“援助”方面的工作展开, 因此, 讨论发展的内容, 离不开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所进行的援助活动。本年度的发展经济学文献综述, 从内容上分为两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发展经济学本身内容的综述, 这反映了广义发展概念的研究进展; 第二方面更聚焦于“发展援助”中的“援助”要义, 考察在援助实施领域中, 围绕传统、新兴援助国、受援国关心问题的研究进展。

作为发展问题风向标之一的世行年度发展报告, 《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关注教育问题。而在教育方面, 教育水平的全球不均等性非常突出, 这也侧面反映出在世界范围内解决发展问题的艰难程度。世行报告指出, 如果学不到知识, 教育就无法实现消除极端贫困并为人人创造共同机会与繁荣的承诺。数百万儿童在入学数年后仍不会读写或基本的算术。这一学习危机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社会差距。青少年学生已经因贫困、冲突、性别或残疾而处于弱势地位, 在成年之前甚至掌握不了最基本的生活技能。<sup>①</sup>在报告给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 加强学习效果评估; 利用哪些做法有效、哪些做法无效的事实证据来指导教育决策; 动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来推动教育变革; 提倡“全民学习”。

与世行年度报告相比, 联合国贸发会议《2018年贸易与发展报告》主题更为直接和尖锐: “权力、平台与自由贸易之幻象”。报告认为, 当前世界经济再次承压, 主要表现是关税战不断升级, 资金流动荡不定。追根溯源, 当前经济发展不稳定主要是由

<sup>①</sup> 世界银行集团. 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 网址: <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7/09/26/world-bank-warns-of-learning-crisis-in-global-education>. 报告内容显示, 最近对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三年级学生做了一个测试, 要求他们用英语或斯瓦西里语读出一个句子, 比如“小狗的名字叫帕皮”。四分之三的学生看不懂这个句子的意思。在印度农村, 三年级学生有将近四分之一不会做两位数减法, 比如“46减17”, 五年级学生还有一半不会做。虽然巴西15岁学生的技能有所进步, 但以他们目前的进步速度, 75年内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数学平均分, 而在阅读方面需要263年。

收稿日期: 2019-12-11

作者简介: 孙靓莹,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国际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研究; 戴绪龙, 副会长, 研究员, 法国SKEMA管理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合作, 战略与国际项目管理等方面的研究。E-mail: sunjy@cass.org.cn

于2008年后超全球化世界的不平等和不平衡加剧。全球债务总量超过全球产出近三倍就是这种失衡的重要体现。银行变得大到不倒,这集中体现了危机前监管机构的恣意玩忽职守。然而,在危机之后的早期改革热潮中,金融机构操纵市场的能力得以保留下来,它们还在努力推翻甚至已经实施的有限监管。权力不对称并非金融市场所独有——全球贸易格局也由大企业主导。尽管发展中国家深化了对全球贸易的参与,但领军企业在全世界生产网络中获取更多附加值的能力导致了不平等的贸易关系。多边主义正受到所有新旧压力的双重夹击,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内向型解决办法不是出路;难的是找到使多边主义发挥作用、造福全人类并确保全球安康的方法,而这仍然任重道远。

## 1 发展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涓滴效应”问题。“涓滴效应”是促进增长、推动发展实践逻辑中的重要一派,按这一内在逻辑,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需要给予贫困阶层、弱势群体或贫困地区特别优待,而是由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通过消费、就业等方面惠及贫困阶层或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Akinci, 2018)<sup>②</sup>的研究则对该理论提出质疑。通过对1995–2011年期间65个国家使用不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Akinci 研究了涓滴效应的有效性。估计结果显示,富人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穷人的收入,反之亦然。但该研究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点是,其研究结果显示,穷人收入转移对富人收入增长的贡献要明显高于富人给穷人。从对上述65个国家的研究可看出,所谓涓滴效应是无效的。

“发展韧性”(development resilience)问题。发展韧性实现发展中国家长期、广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尽管各个国际开发机构在培育“发展韧性”方面花费甚巨,但目前以理论为基础的测量或评估“发展韧性”的方法尚未问世。Dietrich (2018)<sup>③</sup>等

就此提出了在微观层面上估算个人或家庭层面发展韧性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在具体方法上,作者测算了福利函数的多个条件矩——允许潜在的非线性路径动态——因此可以计算和预测满足最小生活标准的个体特定条件概率。此外,作者还开发了一种可分解的弹性测量方法,可以将特定于个体的估计值汇总到可定位的亚种群和人口水平测量中。

在经济发展方面,经济学家进一步探索了其影响因素。2018年文献中,实际汇率、信息通讯技术以及国家历史(经验)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实际汇率问题对经济发展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无论是发展援助还是对外投资,当外部资金流入受援国/东道国国内后,总会引起该国汇率的波动,进而带来经济动荡。(Guzman, 2018)<sup>④</sup>等强调了实际汇率在推动各经济发展中过的重要作用。由于市场对以学习溢出(learning spillover)为特点的部门所进行的投资是不充分的,稳定又充满竞争力的实际汇率政策可以纠正这种外部性干扰及其他市场失灵。这些部门的发展将会进一步带动整体经济的更快速发展。当不同可贸易部门的溢出效应不同时,需要建立多重有效汇率体系。如果传统产业政策能够提高总供给对实际有效汇率的弹性,那么实际有效汇率政策的作用会更大。干预外汇市场、管制资本流动都是实施稳定、有竞争力的实际有效汇率的重要工具。(Allen, 2018)<sup>⑤</sup>等的研究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对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收益是否不同。该分析基于1995–2010年期间59个国家的样本,各种面板数据回归证实了之前报告的ICT资本与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对于所有59个国家的综合样本,ICT的估计产出弹性大于ICT补偿因子,表明ICT资本可获得超额回报。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子样本回归并未揭示这三组国家之间ICT

② Merter Akinci,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rickle-down effect revisited,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ume 36, Issue S1, Pages: 01–024, March 2018.

③ Simone Dietrich, Minhaj Mahmud, and Matthew S. Winter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Government Legitima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8, 80: 1, 133–148.

④ Martin Guzman, Jose Antonio Ocampo, Joseph E. Stiglitz, Real exchange rate polic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10, 2018, Pages 51–62.

⑤ Franklin Allen, Laura Bartiloro, Xian Gu, Oskar Kowalewski, Does economic structure determine financial struc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ume 114, 2018, Pages 389–409.

产出弹性的统计差异。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信息通信技术投资并没有比发达经济体获得更多,这使人质疑这些国家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取得“赶超”的论点。吴辉航(2018)<sup>⑥</sup>的研究结果与此略有不同。通过研究基于1970-2014年110个受过世界银行援助的国家面板数据,发现提升贫困地区的通讯基础设施水平能够有效地加快信息传递,降低受援国HIV感染率、失业率以及辍学率,从而有效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研究为中国提倡的“南南合作式”援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国家的存在是和社会和经济发展最可靠的预测指标之一,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历史发挥了重要角色。(Borcan等,2018)<sup>⑦</sup>对一项既有“国家古代指数”(State antiquity index of Bockstette et al,2002)进行编码,覆盖了全球除最小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时间跨度从3500年前至今。该研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认为累积的国家经验会提高该国的总生产力水平,但是新建国家或相对无经验国家可以通过从拥有更长历史的国家那里学习进而实现更高水平的生产效率最大化。这种相对发展的预测规律通过了实证分析检验。该研究的关键发现之一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现有水平与该国的累计历史长度有倒U型关系。

在有关国际发展政策方面,2019年是皮尔逊国际发展委员会公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伙伴报告》50周年,(Keijzer,2018)<sup>⑧</sup>指出,自主性和伙伴关系任然是国际发展合作指导原则。当前在国际发展领域,促进自主性建和仍然存在挑战。在2005到2008年期间,国际援助实施议程强调各个国家对援助项目的支持,促进受援国在援助项目开展中的自主性。同时,该研究认为目前国际发展议程重点落在了应对国家发展挑战之外,更重视各国共同解决国际性挑战。与此趋势相反,地缘政治发展现实和

对多边机构包容性降低压缩了应对这种跨境挑战的有效参与空间。

## 2 发展领域中有关援助问题的研究

### 2.1 援助的动因

关于对外援助的争论一直存在。经济学家们的研究重点在如何有效地衡量援助的效果。而捐助国的批评人士则认为援助将钱浪费在腐败大亨或不值得接受的人身上。在研究中最被忽视的是对外援助的政治性本质。通过回顾冷战时期对外援助的起源和演变,(Engerman,2018)<sup>⑨</sup>研究了发展援助的核心战略思想和政治成本。在《援助的价格》一书中,恩格曼认为超级大国把外国援助作为冷战的工具。印度是前殖民地中最大的一个,在美苏援助竞争中处于中心地位。两个超级大国的官员都将发展援助视为通过经济手段追求地缘政治的工具。但印度官员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们寻求超级大国的援助来推进自己的经济愿景,从而将外部资源带入国内有关印度经济未来的辩论中。恩格曼引用了来自七个国家的一系列文件,其中许多是最近解密的,重建了一个印度领导人利用冷战竞争在国内赢得战争,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侵蚀了印度的国家性。

全球援助世界发生变化,部分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力量的重新配置和全球金融危机。面对大多数北方经济体的经济衰退,上述国家集体外援的贡献并未下降。然而,其叙事和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这种新情况多以“共同繁荣”的概念为目标,却构成了旨在促进私营部门贸易和投资的明确自身利益的回归。(Mawdsley,2018)<sup>⑩</sup>从新西兰和英国获取证据,认为援助计划越来越多地成为“出口刺激计划”。

政治因素如何影响外援分配?认识到援助可以作为一种诱因,(Woo等,2018)<sup>⑪</sup>认为。在美国是唯一一

⑥ 吴辉航,白玉.“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兼论通讯基础设施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3):71-79.

⑦ Oana Borcan,Ola Olsson,State hist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vidence from six millennia,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March2018, Volume23, Issue1, pp1-40.

⑧ Niels Keijzer,Stephan Klingebiel,Charlotte Örmemark,Fabian Scholte, . Seeking balanced ownership in chang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publisher:Expert Group on Aid Studies(EBA),2018. isbn:978-91-88143-43-3.

⑨ Engerman,David C.The Price of Aid The Economic Cold War in Ind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8.

⑩ Emma Mawdsley,Warwick E,Murray John Overton,Regina Scheyvens,Glenn Banks,Exporting stimulus and" shared prosperity":Reinventing foreign aid for a retroliberal era,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ume36, Issue S1, March2018, Pages25-43.

⑪ Byungwon Woo,Eunbin Chung,Aid for Vot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and American Aid Allocation, Volume:66 issue:4, page(s) : 1002-1026,2018.



个“通过援助”购买选票以便最大化有利票数的国家时,美国有动力向联合国大会先前反对它的国家提供援助。当有一个竞争对手试图购买选票时,就像冷战期间的情况一样,美国有动力向那些已经支持其立场的国家提供援助。Woo 通过实证证明,美国只有在后冷战时期才对美国持有不利地位的国家提供更多援助。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会提供外援?虽然新兴捐助者在发展资金方面越来越重要,但目前缺乏其援助分配的系统数据,这限制了对其援助动机的理解。(Kavakli, 2018)<sup>⑫</sup>使用主要新捐助国土耳其自 1992 年以来的详细数据来解决这一差距。研究表明,国内政治对土耳其提供援助的优先事项产生了很大影响。土耳其的援助过去是由国际联盟和共同性决定的,但在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Adaletve Kalkinma Partisi) 掌权后,政治关系失去了重要性。土耳其开始向贸易伙伴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并向穆斯林国家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虽然这种对贸易关系的新关注使土耳其与传统捐助者更加相似,但文化联系日益增强又使得土耳其对外援助有了不同其他的新特点。根据该研究,政府变革会显著影响新兴捐助者提供援助的方式,进而预测不同援助类型中的未来变化趋势。

在援助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增加的背景下,(Matteis, 2018)<sup>⑬</sup>研究了援助国在提供援助过程中的模仿行为。研究结果强调,虽然捐助者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传播援助波动的潜在渠道,但在存在已确定的模仿行为的情况下,这种波动的程度会显著下降。这一结果表明,促进捐助者的模仿行为将有助于遏制当前和不断增长的援助供应波动趋势。

外国援助占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左右。为了在受援国分配援助,西方捐助者

越来越依赖非政府组织。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已有 39 个发展中国家通过了限制外国援助流入其管辖范围内的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为了应对这些限制,双边捐助者是否减少了援助,无论是作为惩罚还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合适的非政府组织来提供援助?(Dupuy, 2018)<sup>⑭</sup>通过审查 1993-2012 年期间 134 个援助接受国来探讨这个问题。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援国采用限制性非政府组织金融法律后,随后几年双边援助流入量会下降 32%。即使在控制了民主和公民自由的水平之后,这些调查结果仍然稳健,这表明援助的减少是对受援国将非政府组织从援助交付链中提出的回应,而不是对民主衰退的回应。

对于援助国的公众或个人态度如何引导援助流向,学者们分别进行了相关研究。

援国的人权实践如何影响有关外援分配的决定?(Heinrich, 2018)<sup>⑮</sup>为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将捐助者政府,捐助公民和受援者的特征汇集在一个单一的分析框架中。Heinrich 认为,捐赠公民比以前假设的更自私;当受援国提供重要的政策利益时,捐赠公民并不全心全意地支持本国政府惩罚侵犯人权者。当捐助国政府认为他们的公民会让他们的政策选择负责时,他们做出的外国援助决定会反映出本国公民的自私政策偏好。因此,援助国政府会避免惩罚作为有价值的利益来源的专制政权。Heinrich 的实验和观察结果证实了这一判断。总体而言,援助捐助者在减少援助来惩罚侵犯人权的受援国时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对侵犯人权的受援国的多样化待遇主要源于其选民的自私政策偏好。

近年来私人外援急剧增加,但目前仍缺乏有关私人援助流量分配的详细资料。(Desai, 2018)<sup>⑯</sup>使

<sup>⑫</sup> Kerim Can Kavakli,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Motives of Emerging Donors: Evidence from Turkish Foreign Aid,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ume: 71 issue: 3, page(s): 614-627, 2018.

<sup>⑬</sup> Alessandro De Matteis, Follow the leader! The peer effect in aid supply decisions,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ume 36, Issue 6, October 2018, Pages 631-648.

<sup>⑭</sup> Kendra Dupuy, Aseem Prakash, Do Donors Reduce Bilateral Aid to Countries With Restrictive NGO Laws? A Panel Study, 1993-2012,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Volume: 47 issue: 1, page(s): 89-106, 2018.

<sup>⑮</sup> Tobias Heinrich, Yoshiharu Kobayashi, Leah Long, Voters Get What They Want (When They Pay Attention): Human Rights, Policy Benefits, and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2, Issue 1, March 2018, Pages 195-207, <https://doi.org/10.1093/isq/sqx081>.

<sup>⑯</sup> Raj M Desai, Homi Kharas, What Motivates Private Foreign Aid? Evidence from Internet-Based Microlen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2, Issue 3, September 2018, Pages 505-519, <https://doi.org/10.1093/isq/sqy023>.

用一种新方法审查个人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的资金决策。具体是考察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家向一家以美国为基地的互联网组织提出贷款请求后获得贷款的速度,该组织将个人捐款汇聚在一起并将其作为无息贷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存活率分析(survival analysis)表明几乎没有证据说明私人捐赠者是理性的援助者,也没有看到私人资助者模仿官方援助机构的行为。相反,私人小额贷款似乎主要受到人道主义危机的影响,以及来自受援国的移民和侨民网络的影响。Desai的结论是,国际私人援助是由个人捐助者和受援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所塑造的。因此,它可以为传统外援所忽视的领域提供资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私人外援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补充。

(Miyagawa, 2018)<sup>①7</sup>通过调查访谈实验法研究了信息刺激如何改变一国公众对关键外交政策工具:对外援助与军事联盟的看法。由于对外援助的资金来源于国内税收,因此对外援助的持续必须获得广大公众支持。同样,在国外使用武力也需公众支持,在民主国家也是如此。该实验选择日本为研究对象,因日本宪法禁止在国外使用武力,并严重依赖外国援助作为日本在国外发挥影响力的手段。研究结果显示,政治信息会很大程度上改变公众对关键外交政策议程的支持程度。通过在政治信息中改变措辞方式和强调重点,公众的态度确实会发生变化。

外国援助拨款是政府用于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几种重要经济政策工具之一。通过对美国受访者的联合调查,(Blackman, 2018)<sup>①8</sup>表明,受援国宗教是个人对外援助偏好的重要决定因素。特别地,与穆斯林或佛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相比,受访者表示倾向于给予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这种影响可与其他

支持外援的重要决定因素重要意义相仿,例如受援国作为美国盟友或者贸易伙伴的地位。重要的是,偏好基督徒受援国,尤其是福音派基督徒的受访者中非常的突出。本文探讨了宗教影响的两种可能机制:国家层面的宗教认同和个人层面的共同宗教信仰。

## 2.2 援助的效果

外国援助捐助者将自己视为发展项目的资助者,以改善国外公民的态度。目标人群是否以预期的方式接受这些政治沟通,信息是否能成功改变态度?尽管各种机制广泛使用来传播有关外国资金的信息,但是关于其有效性的证据却很少。(Dietrich, 2018)<sup>①9</sup>在孟加拉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中嵌入了一个关于美国资助的健康项目的信息实验。研究发现,虽然当地居民发现对USAID品牌的认可度有限,但有关美国资金的明确信息略微改善了对美国的普遍看法。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受访者对实质性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该研究还发现,有关国外援助者的信息增加了对地方当局信心。研究结果表明,有关外国捐助者的信息可以影响当地民众态度发生变化,但目前的信息传播机制尚不足以做到这一点。

(Van, 2018)<sup>②0</sup>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了官方发展援助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60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将1996年至2016年期间进行小组数据分析,以审查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除了静态关系框架外,还将应用Arellano-bond广义矩量法对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框架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果表明,官方发展援助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最后,官方发展援助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Fashina, 2018)<sup>②1</sup>调查了援助与人力资本之间

<sup>①7</sup> Komiya Y., Miyagawa M., Tago A. (2018)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Stimulus on Levels of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and Coalition Withdrawal. In: Tadokoro M., Egashira S., Yamamoto K. (eds) *Emerging Risks in a World of Heterogeneit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Social Complexity Science*, vol10. Springer, Singapore.

<sup>①8</sup> Blackman, A. (2018). Religion and Foreign Aid. *Politics and Religion*, 11(3), 522–552. doi:10.1017/S1755048318000093.

<sup>①9</sup> Simone Dietrich, Minhaj Mahmud, and Matthew S. Winter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Government Legitima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8, 80:1, 133–148.

<sup>②0</sup> Van Dan D., Binh V. D. (2019)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Kreinovich V., Thach N., Trung N., Van Thanh D. (eds) *Beyond Traditional Probabilistic Methods in Economics. ECONVN2019. Studie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vol809. Springer.

<sup>②1</sup> Fashina, O. A., Asaleye, A. J., Ogunjobi, J. O., & Lawal, A. I. (2018). Foreign aid,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Niger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2), 104–117. doi:10.14254/2071–8330.2018/11–2/8.

的联系如何促进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该研究使用了两种模型：第一个模型用于测试医学模型 (Medicine Model) 在尼日利亚的有效性；而扩展模型分别用恩格尔—格兰杰和矢量误差校正模型 (VECM) 来研究援助和人力资本冲击对增长的影响。第一个模型的结果表明，外部援助流量持续增加超过特定点 (最佳点) 可能会对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从而证实了医学模型的主张。来自该研究的扩展模型证据表明，短期内尼日利亚经济增长对由教育产生的人力资本冲击敏感；但长期影响微不足道。援助影响经济的机制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援国政府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如果政府伴随援助流入而增加教育支出，则可以促进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然而，也有迹象表明，这个依赖援助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可能具有挑战性。

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孟加拉国历来依赖外国资本流入来为国家发展所需的投资提供资金。荷兰病一直是全球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有趣领域。鉴于这一问题，外国援助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的效力往往受到质疑。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外币流入一个国家的突然增加是否会影响到其实际汇率，从而使其经济好转或变坏。因此，(Amin, 2018)<sup>②</sup> 利用包含 1980 年至 2014 年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的多变量框架，研究孟加拉国背景下是否存在“荷兰病”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实际汇率为实际基本面要素函数 (function of real fundamentals)，包括净官方发展援助流入，政府支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和汇款流入。该模型指出非贸易商品部门相对支出的增加将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汇率产生升值压力。研究结果表明，在 1980-2014 年期间，孟加拉国的外援援助流入后并没有引发荷兰病。孟加拉国适当的汇率制度和央行对汇率的严格控制使得外国援助并没有让实际汇率升值。因此，Amin 认为孟加拉国可以继续吸收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而不必担心失去出口竞争力。此外，理想情况下，所收到的外国援助应投资于可贸易部门，避免对该国实际汇率产生升值压力。

(Hulme, 2018)<sup>③</sup> 探讨了英国政党是否已将发展合作的理解从国际发展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外援，转向更“全球发展 (global development)” 。其分析框架以发展承诺指数 (CDI) 的组成部分为基础，另一个主题是“解决全球不平等问题”。调查结果总体表明，所有英国政党逐渐从关注援助、贸易和安全问题的“国际发展” 转向更关注社会公平、解决全球不平等的“全球发展”。受全球发展多变分析框架影响最少的政党是 UKIP，该党更支持激进的民族国家视角，将国际合作视为威胁。保守党在利用全球发展塑造起政策承诺中变化最少。自由民主党和工党在转向全球发展中前后更为一致。在有关具体发展议题上，所有党派均提高了对有道德的融资、发展技术和全球不均等的承认和承诺，对援助的关注降低。具体来说，在 1997 年，没有任何党派提到有道德的融资 (ethical finance，其中包括税收公平) 和发展技术 (例如健康、气候变化研发)；移民问题和全球不平等问题在 1997 年的党派竞选中只是略有提及。2018 年所有党派在技术、金融、环境、移民及全球不平等问题上的得分都更高，显示出所有党派都不同程度上将全球发展问题纳入到自己的日程上。2005 年之后，所有党派都更为重视全球发展问题，并将承诺写入竞选宣言。

外援能否建立和平？鉴于世界上的穷人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这一答案对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来说至关重要。学者们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主要研究外援与内战之间的关系。(Findley, 2018)<sup>④</sup> 通过对援助与内战的发生，发展和复发相关联的关键理论论点的调查来评估现有文献。对援助分配研究的不足是一个主要困难，因为援助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非随机的，这使得因果效应难以推断。Findley 提出了五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关于援助流动的微观基础理论假设；存在其他外交政策选择背景下的援助提供；可能调解或缓和援助影响的其他因素；观察层次、总量水平及其测度。

有证据表明，目前除非洲以外，世界所有地区的贫困都在减少。撒哈拉以南非洲约有 45% 的国家

<sup>②</sup> Amin, Sakib Bin & Murshed, Muntasi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Aid And Dutch Disease In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vol. 52 no. 2, 2018, pp. 169-182. Project MUSE, doi: 10.1353/jda. 2018. 0029.

<sup>③</sup> Hulme, David and Sifaki, Eleni (2018)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development in the UK? Recent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party manifestos. GDI Working Paper 2018-025. Manchester: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sup>④</sup> Michael G. Findley, Does Foreign Aid Build Peac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 21:1, 359-384.



没有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极端贫困目标。(Asongu, 2018)<sup>⑤</sup>评估了增加外国援助是否有助于改善贫困状况。该研究评估了53个非洲国家在2005–2012年的数据。采取的对外援助变量包括“人道主义援助”、“债务行动”、“对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对生产部门援助”、“对多部门援助”、“对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项目援助”。通过广义矩量法(GMM)及工具变量Tobit回归,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利用GMM法控制包容性人类发展的持续性、同时性和不变遗漏变量后:“对生产部门援助”具有协同效应,“项目援助”具有正的净效应。“对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净效果为负,边际效应为正。采取Tobit回归分析控制同时性及因变量有限范围后,“对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具有协同效应,“对社会基础设施援助”、“对生产部门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净效果为负,但边际效应为正。

近年来,政策界和学术界对利用外援减少国际移民产生了兴趣。学者们已经调查了这种援助迁移关系,但结果好坏参半,问题仍然存在。移民问题成为2018年研究援助效果中的一个突出方面。虽然援助国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提供对外援助来阻止移民流动,但(Lanati, 2018)<sup>⑥</sup>经验证据指向相反的方向:通过放松预算约束,援助倾向于鼓励人们移民。该研究扩展并调整了国际移民引力模型来重新审视援助—移民联系。与之前的文献相反,Lanati获得了一个国家获得的援助总额与移民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的证据。这甚至适用于受援国较贫穷的地区,这表明预算约束在移民决策中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这些对比结果最合理的解释是,与以前的研究不同,该研究使用的是移民流量而不是移民存量作为因变量。从实质上讲,预算约束重要性有限可能反映出外国援助所产生的福利效应往往体现在改善穷人的公共服务而不是高收入。

面对传统移民控制的失败,美国和西欧的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寻求外援来减少移民流入。一些分析师预计援助将帮助改善来源国的生活水平,从而阻止居民迁往国外。虽然这个想法具有直觉意义,但对援助和移民的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一些学术研究认为援助能阻止移民,但其他分析表明,援助实际上通过为个人提供资源使得跨境移动更容易。(Gamso, 2018)<sup>⑦</sup>认为文献研究结果的冲突的原因在于研究者未能区分不同类型的外援。借鉴最近展示各种援助项目异质性影响的工作,Gamso认为治理援助可以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和减轻政治影响因素来阻止移民;相反,经济和社会援助会通过增加个人移动手段和能力而增加移民。对101个发展中国家,历时25年(1985–2010)样本的实证分析证实了这一假设。研究发现治理援助确实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率,而其他类型的援助似乎不会影响移民。

(Gamso, 2018)<sup>⑧</sup>研究认为,对农村地区的发展援助会阻止受援国移民,而对城市地区的发展援助则不会帮助减少受援国移民。Gamso在研究中假设,虽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发展援助减少了这些国家的移民,但提高城市发展援助却会产生相反的效果——移民率更高。这些假设是由两个理论机制证实的。第一种机制侧重于农村和城市人口对移民的不同偏好。援助为这两个群体分别提供了不同资源,以推动他们移民的意愿,或者阻碍这种意愿。第二个机制着重对比农村及城市援助对农业部门发展的影响以及这种发展对移民的影响。Gamso通过检验跨国时间序列数据来验证这一假设,发现获得更多农村发展援助的国家移民率较低。然后利用阿拉伯晴雨表(Arab Barometer)调查数据来评估受访者的态度是否符合理论机制。然而,这些调查结果并不表明农村和城市人口在移民意愿方面有所不同。

(卢晨, 2018)<sup>⑨</sup>利用1980–2010年49个受援国

<sup>⑤</sup> Simplice A. Asongu, Jacinta C. Nwachukwu, Increasing Foreign Aid for Inclu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 Afric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July 2018, Volume 138, Issue 2, pp 443–466.

<sup>⑥</sup> Mauro Lanati, Rainer Thiele,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migration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11, 2018, Pages 59–74.

<sup>⑦</sup> Jonas Gamso, Farhod Yuldashev, Targeted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s Development–Promotion an Effe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2, Issue 4, December 2018, Pages 809–820, <https://doi.org/10.1093/isq/sqy029>.

<sup>⑧</sup> Jonas Gamso, Farhod Yuldashev, Does rural development aid redu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10, October 2018, Pages 268–282.

<sup>⑨</sup> 卢晨, 陈颂, 胡恒昌. 国际援助对受援国国际移民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8(6): 23–33.

所接收的国际援助与其向援助国的国际移民数据,对国际援助如何影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第一,受援国所接收的国际援助对于其向援助国的国际移民起到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而且这一影响对男性移民和女性移民都成立。第二,就移民总体而言,官方发展援助对国际移民存在着促进作用,但是非官方发展援助却具有抑制作用。但是,这一援助资金的结构差异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移民群体的分样本分析中却不存在。尽管如此,受援国国内经济环境对高等教育移民者的移民决策却是依赖于国际援助的不同资金类型。第三,根据受援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国际援助对国际移民的影响效应具有“U”型非线性特征。

在研究援助有效性问题上,借助新学科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手段与实证方法。(Bitzer等,2018)<sup>⑩</sup>对援助与次国家区域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网格单元分析法。Bitzer使用同等大小的网格单元研究世界银行发展计划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以纬度x经度为0.5度的空间分辨率作为调查单位。该论文所提出的网格单元方法解决了援助有效性文献中讨论的许多内生性问题,例如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缺乏关键的国家层面控制变量;聚合偏差;将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中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测量误差等。估计数据显示,以夜间灯光增长为指标,世界银行的对外援助项目对被测网格单元经济活动做出了重大贡献。即使存在未观测到年份、网格单元异质性、以及控制网格单元内社会经济、人口、冲突、生物地理、气候等因素,其研究结果仍然稳健。额外的敏感度测试证实了研究发现对各种计量经济学估计,替代模型方法和不同空间聚合水平的稳健性。(Civelli,2018)<sup>⑪</sup>基于区域空间面板矢量自回归模型(Sp P- VAR)研究了对外援影响的测量方法。Civelli选择乌干达地区进行了说明。该研究的区域单位(ADM2)数据结合了以下几部分的数据:社会

经济活动的卫星数据、地区援助分配数据、传统家庭调查。我们发现援助冲击对夜间光度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正向和持久影响。将夜灯映射到经济活动,结果表明这些影响的经济规模很小,但很重要——从长远来看,乘数在4到5之间。

在国际区域性恐怖主义和局部战争发生的前提下,包括援助在内的诸多因素将如何影响该地区的福利变化,(Evans等,2018)<sup>⑫</sup>利用尼日利亚作为1980年至2016年期间的案例进行了研究,以确定外国直接投资(FDI),贸易,援助,汇款和旅游业对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国家的福利影响。该研究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边界检验方法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贸易,援助,汇款和旅游业对福利产生了积极的重大影响,即使在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下也是如此。但是,从长远来看,只有援助和汇款才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旅游业影响微不足道。换句话说,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旅游流入因长期存在的恐怖主义和好战而受到压制,这意味着它们无法在紧张和不安全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存在战斗和恐怖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援助和汇款仍然对福利产生重大影响。调查结果还表明,恐怖主义和武装分子在短期和长期都对福利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总之,恐怖主义和武装冲突不仅破坏了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和旅游业,而且还导致福利大幅下降。

Lis(2018)<sup>⑬</sup>从部门层面研究武装冲突,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是否影响双边和多边外援的分配。该研究认为,由于捐助者的不同目标和提供援助的动机,这两种援助对安全挑战的反应可能不同。结果表明,武装冲突减少了受援国所有类型的援助金额。多边捐助者不太可能将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列入受援人名单。如果一国是恐怖主义的主要目标对象,那么该国国内恐怖主义会增加双边援助——但双边援

<sup>⑩</sup> Bitzer, Jürgen; Gören, Erkan (2018): Foreign aid and subnational development: A grid cell analysis, Oldenburg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No. V-407-18,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ldenburg.

<sup>⑪</sup> Andrea Civelli, Andrew Horowitz, Arilton Teixeira, Foreign aid and growth: A Sp P- VAR analysis using satellite sub-national data for Ugand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34, September 2018, Pages 50-67.

<sup>⑫</sup> Evans, Olaniyi and Kelikume, Ikechukwu,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id, Remittances and Tourism on Welfare under Terrorism and Militancy (November 20, 201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Vol. 7(3), pp. 206-232.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287759>.

<sup>⑬</sup> The impact of armed conflict and terrorism on foreign aid: A sector-level analysis, World Development, Volume 110, 2018, Pages 283-294.



助的增加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如果将援助按目的分解,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双边援助增加主要目的是促进治理,教育,健康和社会发展。

外国援助在减少恐怖主义方面有效吗?现有证据大多是否定的。(Savun Burcu,2018)<sup>③④</sup>认为,援助作为反恐工具无效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只关注援助的一种功能——经济援助的结果。治理和民间社会援助可以通过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来抑制受援国对恐怖主义的参与和支持。研究显示,得到高水平治理和民间社会援助的国家比那些很少或根本没有得到此类援助的国家经历更少的国内恐怖主义事件。使用一个受援国的样本分析从1997到201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治理援助和民间社会援助是有效的抑制国内恐怖主义的方式,但这种影响只存在于受援国没有内战冲突。Savun Burcu的发现为继续使用民主援助作为反恐工具提供了支持。

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合法性的影响是什么?近年来,中国大大增加了对非洲援助的范围,引发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争论,其中一些人将中国描述为破坏公民与受援国之间社会契约的“流氓捐赠者”。(Blair,2018)<sup>③⑤</sup>将对利比里亚原始调查、调查实验和行为游戏的国内分析与对38个非洲国家的援助数据和非洲晴雨表数据的跨国分析结合起来,检验这一命题。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接触中国援助削弱了非洲人对政府的看法,或降低了税收合规度或道德感——这都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指标。上述结果在不同的背景、分析水平、衡量和识别策略上都是一致的,这与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参与危及善政或疏远非洲受援国公民的传统观点背道而驰。

近年来,源自中国的“援助”在国际社会中遭遇了很多批评。政策制定者,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声称,中国利用其慷慨的手段巩固与政治领导人的联

盟,安全获取自然资源,为中国企业创造独特的商业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以牺牲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公民为代价的。(Dreher,2018)<sup>③⑥</sup>认为,关于中国“援助”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未能区分中国官方发展援助(ODA)和更多商业导向来源和国家融资类型。其发现,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主要受到外交政策考虑,非优惠贷款的分配增多地受到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该研究使用了一个关于中国2000年至2013年对非洲的官方融资承诺的新数据库。同时,对本论文的研究也表明,对非西方的融资活动,研究者需要更精确的工具进行测量和评估。

中国走出去政策的一个目标是在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参与引起了很多批评。(Eichenauer,2018)<sup>③⑦</sup>首次研究这些活动是否会改变发展中国家个人在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对中国的态度。利用来自Latinobarómetro的重复横断面调查数据,该研究分析了中国对拉丁美洲的出口,对外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量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拉丁美洲18个国家在2002-2013年期间对中国的看法。通过利用中国出口,援助和投资的外部变化来代表中国在拉丁美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渗透,从而进行工具变量回归。与广泛的批评相比,没有发现中国在各自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恶化对中国的平均态度的证据——无论是在国家还是省级。然而研究结果表明,年轻、受过教育、经济上有特权的人群对中国看法更积极。这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参与创造了赢家和输家。

新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援助和投资并举的方式推动中拉合作减贫,主要特征为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经济增长与“能促型”减贫相结合,国有资本主导和市场参与相结合。中国援助与投资整体上有助于拉美国家减贫,但不同类型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有所差别。(张原,2018)<sup>③⑧</sup>分析指出,在“一带一路”倡

<sup>③④</sup> Savun Burcu, Tirone Daniel C. Foreign Aid as a Counterterrorism Too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62(8), 1607-1635.

<sup>③⑤</sup> Robert A. Blair, Philip Roessler, The Effects of Chinese Aid on State Legitimacy in Africa: Cros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Evidence from Surveys, Survey Experiments, and Behavioral Games, WORKING PAPER 59, July 2018, AIDDATA, A Research Lab at William & Mary.

<sup>③⑥</sup> Axel Dreher, Andreas Fuchs, Brad Parks, Austin M Strange, Michael J Tierney,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ume 62, Issue 1, March 2018, Pages 182-194, <https://doi.org/10.1093/isq/sqx052>.

<sup>③⑦</sup> Vera Z. Eichenauer, Andreas Fuchs, Lutz Brückner, The Effects of Trade, Aid, and Investment on China's Im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646, March 2018.

<sup>③⑧</sup> 张原.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J]. 太平洋学报, 2018, 26(12): 61-73.

议背景下,中拉合作开发潜力较大,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拉美国家政府治理能力、市场效率、援助和投资碎片化以及中国对外合作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影响了中拉合作减贫的持续推进。对此,中国需要不断完善多渠道合作融资模式,平衡基础设施建设与“能促型”减贫之间的关系,加强中拉政府治理能力和市场制度建设交流,构建“弘义融利、开放包容”的对外合作开发体系,持续推进中拉合作减贫。

(朱丹丹,2018)<sup>⑨</sup>基于中国对非洲16个受援国2000-2011年援助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步回归法,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出口渠道的传导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外援助会显著促进非洲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但该促进作用会产生“门槛效应”;(2)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增加受援国的出口总额,通过出口总额渠道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即中国的对外援助确实能够通过国际贸易渠道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促贸援助”模式是有效的;但是,不通过出口渠道发挥作用的对外援助则会阻碍受援国的经济增长。(3)受援国期初的经济状况会影响其现在的经济增长,受援国的人口增加和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其出口的增加。

### 2.3 援助的运行机制

援助计划应该微观管理他们的工作吗?或者他们是否应该让工作人员在实地自行决定?(Dan, 2018)<sup>⑩</sup>借鉴了一个新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9个机构的14,000多个独立开发项目,以及8个定性研究。他认为,严格控制和狭隘地关注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可能会阻碍前线救援人员利用他们的技能解决当地问题,从而破坏外援的表现。他认为展示结果的压力可能会削弱绩效,特别是在难以衡量绩效的不可预测的环境中。

薛澜(2018)<sup>⑪</sup>从国际经验借鉴的角度出发,采用“使命定位—运行模式—治理结构”(MOG)这一分析公共组织的系统框架作为比较对外援助机构的分析框架,在OECD-DAC援助体系下选择挪威、加拿大、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代表,分别从使命定位、运

行模式、机构设置、立法与协调机制、监督与评估等比较分析并得出对中国援外体系改革的启示。中国应采取的措施是:制定对外援助的国家战略,进行全局性部署;构建中国对外援助的法制化体系,提高对外援助机构的行政级别,给予其更大的机构自主性;明确部际间的职能划分和协调,加快建立援外监督评估体系等有助于将中国发展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取得援助有效性的最大化,最终实现援外战略布局。

当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新时期对外援助承载的历史使命和战略任务对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运行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改革和调整援外管理体制机制,使援外工作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战略。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机构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新的援助机构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于2018年4月落成。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机构,国和署将带来中国对外援助实施结构发生重大变化。(Kitano, 2018)回顾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现状:形式和实施结构,援助政策,援助量和未来挑战。(王涿,2018)<sup>⑫</sup>指出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改革援外管理体制机制过程中,要立足于“战略统筹、决策科学、集中管理、权责一致、结构优化、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目标,坚持系统集成、本土特色、高效廉洁三大原则,采取加快规划建设、建立援外政策规划体系、强化对外援助工作的归口管理、理顺援外项目垂直管理体系等举措,使援外工作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胡建梅, 2018)<sup>⑬</sup>研究指出,从协调范围看,国际发展援助的协调包括全球性协调、区域性协调、受援国当地的协调和援助国内部协调四个层次。在各层次的协调中,中国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以及其他援助国之间的对话,积极参与制定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与受援国的援助协调应突出受援国的主体地位,建立与受援国之间充分的信息流动机制。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建立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sup>⑨</sup> 朱丹丹, 黄梅波. 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吗? ——兼论“促贸援助”方式的有效性[J]. 中国经济问题, 2018(2): 24-33.

<sup>⑩</sup> Dan Honig, Navigation by judgment: why and when top down management of foreign aid doesn't work,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sup>⑪</sup> 薛澜, 翁凌飞. 西方对外援助机构的比较与借鉴——改革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1): 107-113.

<sup>⑫</sup> 王涿. 关于改革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机制的思考[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4): 76-83.

<sup>⑬</sup> 胡建梅, 黄梅波. 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的构建: 中国参与的可能渠道[J]. 国际经济合作, 2018(8): 22-32.

中国学者对中国在非洲、亚洲等地的对外援助模式进行了总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的提供者,中国一直以“平等、共赢、互利”为指导,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帮助它们解决实际问题。其中农业对减贫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农业方面自身发展的成就和成功经验,一直是中国减贫战略研究的重点领域。(Zhang, 2018)<sup>④</sup>指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已成为中国对非洲国家农业援助的重要模式之一。随着第一批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该机制如何运行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工作者和决策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在国内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莫桑比克农业技术合作中心是非洲首批农业技术合作中心之一,通过引进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农业部门的私人 and 公共投资,探索了扩大农业技术转让的途径。在对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农业技术转移实践进行长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当地的角度分析了南南合作“援助+投资”模式的实践、影响和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中国农业技术转移提供借鉴。

坦赞铁路的修建,是在冷战背景下中国领导人从外交战略角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中非两国相互帮助、互利共赢的历史见证。铁路从提出到技术合作已有 50 多年的历史,它见证了非洲人民独立的决心(“自由铁路”),改变了铁路沿线人民的生活(“铁路走向繁荣”),展示了泛非和中非合作的力量(“友谊铁路”)。塔扎拉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对外援助项目。它见证了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管理体制,Guo (2018)<sup>⑤</sup>研究了这一重要案例,进一步分析挖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发展和特点。

中国对柬埔寨的经济援助始于 1956 年。60 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捐助国,或南南合作的提供者,(Zhou, 2018)<sup>⑥</sup>分析后总结认为,一方面中国提供了相当多的基础设施和民用设施,为柬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的援助项目也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技能发展和文化保

护。吴哥窟文物修复工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中国对柬援助采取“硬”和“软”相结合的方式,遵循平等互利、尊重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以需求为导向等南南合作原则。通过这种方式,中国对柬援助得到了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政治和社会效益显著,为中柬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 3 结论

经济发展问题在 2018 年的研究进展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进一步探讨了研究边界。从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中期开始提出发展议程至今,除了中国减贫的进展外,全球贫困问题仍然根深蒂固,发展不平衡、不平等状态日益加剧。对“涓滴效应”所得出的否定研究结论可以看作是“中心—外围”理论核心内容的又一次验证。各国的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地理位置与发展历史不同,因此在研究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之间,必要条件容易识别,充分与必要条件似乎尚未形成统一共识。2018 年中有关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重要问题:有效汇率、ITC 和国家历史经验都可以被看作是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推而广之,围绕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建立在不同“数据库”加“研究方法”后得出的相左研究结论也就容易理解了。

地缘政治、移民、反恐以及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探讨是 2018 年对外援助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现有的主流研究内容很难摆脱现实主义的出发点,对外援助是主要援助国内政外交的延伸——无论是对于传统援助国还是对新兴援助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里最为突出的就是移民问题,援助国通过援助手段,避免或减少来自援助国的移民是现实政治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实,从这一角度出发所给出的援助目的,并不是受援国国家治理、民生改善或经济发展。援助国通过援助资金、援助方式和援助领域的选择,最终是为了使在移民来源国“终端”将之解决。

围绕中国对外援助对受援国影响的研究在中西方学者中日益增加。几个主要的研究结论包括:

<sup>④</sup> Zhang C. (2018) "Aid+Invest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id Project in Mozambique. In: Huang M., Xu X., Mao X.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sup>⑤</sup> Yu Guo.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Ai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M]. Springer Singapore: 2018-12-07.

<sup>⑥</sup> Zhou T. (2018) A Blend of "Hard" and "Soft" Assistance: China's Aid to Cambodia. In: Huang M., Xu X., Mao X.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1)从研究的主要结论上看,几乎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接触中国援助削弱了非洲人对政府的看法,或降低了税收合规度或道德感——这都是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指标。这与中国不断增加的经济参与危及善政或疏远非洲受援国公民的传统观点背道而驰。(2)关于中国“援助”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未能区分中国官方发展援助(ODA)和更多商业导向来源和国家融资类型。其发现,中国官方发展援助的分配主要受到外交政策考虑,非优惠贷款的分配增多地受到经济利益考量的影响。(3)中国通过援助和投资并举的方式推动合作减贫,主要特征为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经济增长与“能促型”减贫相结合,国有资本主导和市场参与相结合。中国援助与投资整体上有助于拉美国家减贫,但不同类型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有所差别。

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新兴交叉学科的涌现,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进入了发展经济学以及对外援助领域的视野,基于更科学方法获得数据为上述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更为客观、坚实的基础。就“发展韧性”问题而言,新的微观层面估算个人或家庭层面发展韧性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测算福利函数的多个条件矩——允许潜在的非线性路径动态——进而计算和预测满足最小生活标准的个体特定条件概率)让这一领域研究更为科学。网格单元分析法成为对援助与次国家区域发展研究的新研究单位。Bitzer通过使用同等大小的网格单元研究世界银行发展计划对地方发展的影响,以纬度 $\times$ 经度为0.5度的空间分辨率作为调查单位。该论文所提出的网格单元方法解决了援助有效性文献中讨论的许多内生性问题,例如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缺乏关键的国家层面控制变量;聚合偏差;将发展援助与经济增长相联系中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测量误差等。

2018年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然而,一个阴影也在地平线上出现:发展需要资金——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发展援助——而获取发展资金的代价是全球债务问题的日益恶化。2018年全球债务已经达到GDP总额的三倍,资金无疑是发展问题面临诸多约束问题的重中之重。发展与债务问题,发展援助与债务问题曾在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一波热潮,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发展经济学的学术界研究尚未从新的时代背景重新审视发展与债务、

对外援助与受援国债务问题,这无疑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 参考文献

- [1] Alessandro De Matteis, Follow the leader! The peer effect in aid supply decisions[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8, 36(6): 631-648.
- [2] Amin, Sakib Bin & Murshed, Muntasi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Foreign Aid And Dutch Disease In Bangladesh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018, 52(2): 169-182.
- [3] Andrea Civelli, Andrew Horowitz, Arilton Teixeira, Foreign aid and growth: A Sp P-VAR analysis using satellite sub-national data for Ugand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 134: 50-67.
- [4] Axel Dreher, Andreas Fuchs, Brad Parks, Austin M Strange, Michael J Tierney, Apples and Dragon Fruits: The Determinants of Aid and Other Forms of State Financing from China to Africa[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1): 182-194.
- [5] Bitzer, Jürgen; Gören, Erkan (2018): Foreign aid and sub-national development: A grid cell analysis [N]. *Oldenburg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No. V-407-18, University of Oldenbu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Oldenburg.
- [6] Blackman, A. (2018). Religion and Foreign Aid [J]. *Politics and Religion*, 11(3): 522-552.
- [7] Byungwon Woo, Eunbin Chung, Aid for Vote? [J].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Voting and American Aid Allocation*, 2018, 66 issue (4): 1002-1026.
- [8] Dan Honig, Navigation by judgment: why and when top down management of foreign aid doesn't work [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9] Emma Mawdsley, Warwick E, Murray John Overton, Regina Scheyvens, Glenn Banks, Exporting stimulus and "shared prosperity": Reinventing foreign aid for a retroliberal era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8, 36(S1): 25-43.
- [10] Engerman, David C. The Price of Aid The Economic Cold War in India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11] Evans, Olaniyi and Kelikume, Ikechukwu,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id, Remittances and Tourism on Welfare under Terrorism and Militancy (November 20, 2018)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7(3): 206-

- 232.
- [12] Fashina, O. A., Asaley, A. J., Ogunjobi, J. O., & Lawal, A. I. (2018). Foreign aid,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nexus: Evidence from Nigeri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1(2), 104–117.
- [13] Franklin Allen, Laura Bartiloro, Xian Gu, Oskar Kowalewski, Does economic structure determine financial structur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8, 114:389–409.
- [14] Hulme, David and Sifaki, Eleni (2018)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development in the UK? Recent evidence from political party manifestos [N]. GDI Working Paper, 2018–2–5.
- [15] Jonas Gamso, Farhod Yuldashev, Does rural development aid redu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10:268–282.
- [16] Jonas Gamso, Farhod Yuldashev, Targeted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s Development–Promotion an Effective Immigration Policy?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62, (4) :809–820, <https://doi.org/10.1093/isq/sqy029>.
- [17] Kendra Dupuy, Aseem Prakash, Do Donors Reduce Bilateral Aid to Countries With Restrictive NGO Laws? [J]. *A Panel Study, 1993–2012,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8, 47(1) :89–106, 2018.
- [18] Kerim Can Kavakli,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Motives of Emerging Donors: Evidence from Turkish Foreign Aid [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71(3) :614–627.
- [19] Komiya Y., Miyagawa M., Tago A. (2018)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Stimulus on Levels of Support for Foreign Aid and Coalition Withdrawal. [C]//Tadokoro M., Egashira S., Yamamoto K. (eds) *Emerging Risks in a World of Heterogeneit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Social Complexity Science*, vol10. Springer, Singapore.
- [20] Martin Guzman, Jose Antonio Ocampo, Joseph E. Stiglitz, Real exchange rate polic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10:51–62.
- [21] Mauro Lanati, Rainer Thiele,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migration revisited [J]. *World Development*, 2018, 111:59–74.
- [22] Merter Akinci,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rickle-down effect revisited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8, 36(S1).
- [23] Michael G. Findley, Does Foreign Aid Build Peace?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8, 21:1, 359–384.
- [24] Niels Keijzer, Stephan Klingebiel, Charlotte Örnemark, Fabian Scholte, . Seeking balanced ownership in chang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s [M]. *Expert Group on Aid Studies (EBA)*, 2018.
- [25] Oana Borcan, Ola Olsson, State histo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six millennia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8, 23(1) :1–40.
- [26] Raj M Desai, Homi Kharas, What Motivates Private Foreign Aid? Evidence from Internet–Based Microlending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62(3) :505–519, <https://doi.org/10.1093/isq/sqy023>.
- [27] Robert A. Blair, Philip Roessler, The Effects of Chinese Aid on State Legitimacy in Africa: Cross–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Evidence from Surveys, Survey Experiments, and Behavioral Games [A]. *WORKING PAPER59, July 2018, AIDDATA, A Research Lab at William & Mary*.
- [28] Savun Burcu, Tirone Daniel C. Foreign Aid as a Counterterrorism Tool [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18, 62(8) ,1607–1635.
- [29] Simone Dietrich, Minhaj Mahmud, and Matthew S. Winter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Government Legitima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8, 80;1, 133–148.
- [30] Simone Dietrich, Minhaj Mahmud, and Matthew S. Winters, Foreign Aid, Foreign Policy, and Domestic Government Legitimacy: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8, 80;1, 133–148.
- [31] Simplice A. Asongu, Jacinta C. Nwachukwu, Increasing Foreign Aid for Inclusive Human Development in Africa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July 2018, 138(2) :443–466.
- [32] Tobias Heinrich, Yoshiharu Kobayashi, Leah Long, Voters Get What They Want (When They Pay Attention): Human Rights [J]. *Policy Benefits, and Foreign Ai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8, 62(1) :195–207.
- [33] Van Dan D., Binh V. D. (2019)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on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 Kreinovich V., Thach N., Trung N., Van Thanh D. (eds) *Beyond Traditional Probabilistic Methods in Economics. ECON-VN2019. Studie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vol809. Springer.
- [34] Vera Z. Eichenauer, Andreas Fuchs, Lutz Brückner, The

- Effects of Trade, Aid, and Investment on China's Im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8, 3: 646.
- [35] Yu Guo.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oreign Aid: The Tanzania-Zambia Railway [M]. Springer Singapore; 2018-12-07.
- [36] Zhang C. (2018) "Aid + Investmen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pproach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id Project in Mozambique [C]//Huang M., Xu X., Mao X.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 [37] Zhou T. (2018) A Blend of "Hard" and "Soft" Assistance: China's Aid to Cambodia [C]//Huang M., Xu X., Mao X. (ed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Chinese Foreign Aid. Palgrave Macmillan, Singapore.
- [38] 胡建梅, 黄梅波. 国际发展援助协调机制的构建: 中国参与的可能渠道[J]. 国际经济合作, 2018(8): 22-32.
- [39] 卢晨, 陈颂, 胡恒昌. 国际援助对受援国国际移民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8(6): 23-33.
- [40] 王涿. 关于改革我国对外援助管理体制机制的思考[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4): 76-83.
- [41] 吴辉航, 白玉. “南南合作式”国际援助的有效性研究——兼论通讯基础设施对受援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1(3): 71-79.
- [42] 薛澜, 翁凌飞. 西方对外援助机构的比较与借鉴——改革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1): 107-113.
- [43] 张原. 新世纪以来中国对拉美援助和投资的减贫效应研究[J]. 太平洋学报, 2018, 26(12): 61-73.
- [44] 朱丹丹, 黄梅波. 中国对外援助能够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吗? ——兼论“促贸援助”方式的有效性[J]. 中国经济问题, 2018(2): 24-33.

##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N Jingying<sup>1</sup>, DAI Xulong<sup>2</sup>

(1.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China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Beijing 100731,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is a window through which 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changes happening worldwide. In recent years, a lot of research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field of aid motives and aid efficiency, which pushes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these traditional issues and more research is also done in new aspects. Some realistic studies are also conduct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ssues of immigration,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regional wars, terrorism and aid, how aid shapes the recipient country and the effect it has. Moreover, new research method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are also adopted, which can compensate for some shortcomings in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endophytism.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foreign aid; economic geography